

抗日烽火中的颐中三厂地下党组织

□ 唐为昌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全民抗日的序幕。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整个上海沸腾起来,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颐中三厂(即英美烟公司上海卷烟三厂)工人也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颐中三厂地下党员和工人先进分子先后参加了“一·二八”公祭、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抗议“七君子”被捕等抗日救亡活动;工人夏良珍加入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后,积极从事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活动,并在党的指示下,到难民收容所从事难民登记、分发饭票、服务病员等工作;青年女工丁月玲、戴林娣等利用工休时间,

上街宣传抗日;陈心慈等与一些学生、店员一起上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激发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

烟厂工人们尽管自己缺衣少食,却在“节约救难”、“节约献金”等活动中四处奔走。例如,曾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颐中三厂女工戴林娣在工友中宣传抗日意义,发动大家捐款捐物。在烟厂工人踊跃捐献的带动下,上海市民也纷纷慷慨解囊。由于颐中三厂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捐献活动中发动面广、募捐钱款较多,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赞扬。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需要大批骨干。颐中三厂地下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先后输送10多名地下党员到新

四军、游击队,为城市支援苏北根据地建设、上海地下斗争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以及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做出了贡献。

1940年1月,颐中三厂地下党支部成员陈炳南、韩翠娥先后参加新四军。同年下半年,陈启英、周晓华、喻贵明、薛善璋、徐鄂等10多位地下党员以及印刷厂的杨群宝相继离厂,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和苏北根据地的建设等工作。这些同志政治上忠诚可靠,多次穿越日军封锁线,执行护送干部、文化名人、进步学生,传送上级情报等任务。陈启英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往返苏沪10余次,先后护送了50余名文化名人、进步学生进入革命根据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日益险恶,为了保存敌占

区干部的有生力量,党中央决定,将江苏省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为了完成这一战略转移任务,周晓华等地下交通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日军严密封锁的敌占区,在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险恶环境下,长途跋涉,先后护送了刘晓、刘长胜、刘宁一等领导进入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任务。

1944年,上级党组织指示颐中三厂党支部,要在工人和当地群众中宣传和散发《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使群众清楚地了解抗战时事及前途。党支部接到任务后,除在党员中组织传阅和学习外,还有计划地秘密发给一些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阅读。对于一部分中间群众和工人,则采用秘密寄送的方法,即确定寄送对象后,把书

刊封入信封或其他一些物品里,半夜无人时将其悄悄塞进寄送对象的门缝里。在日本法西斯的眼皮下开展这些地下工作非常艰险,但党员刘康、陈三连、杨村等都能很好地完成发送任务。《评〈中国之命运〉》在工人中反响强烈,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工人们普遍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战胜利前夕,颐中三厂党支部不但组织工人传阅《时代日报》等进步报刊,还绘制了东至高邮桥、南到黄浦江、西临外虹桥、北达昆明路范围的日本兵营、岗哨及明碉暗堡的地图,并秘密传递给新四军,作为他们进入上海的参考。此外,在颐中三厂党支部的号召下,工人们还组织了救护队、纠察队和医疗队等,为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做好了准备。

买给父亲抽的烟

□ 龙廷茂

父亲喜欢抽烟、喝酒。但父亲抽的烟是自己种的旱烟,喝的酒也是自家酿的米酒。无论去哪里,父亲身上都少不了烟斗、用塑料袋装好的旱烟叶和打火机。走在他的身后,我总会闻到刺鼻的旱烟味。

我参加工作以前,常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唠叨:“这些天,那么累!连条烟都没有抽的。”母亲也不耐烦地反驳他:“要买就买嘛,谁干涉你了。”我知道父亲话里的意思:他想买条烟来抽,但又舍不得花钱,因为他要节约钱给我们念书。平日里,父亲都是抽旱烟,农忙、过节时才会考虑买条最便宜的卷烟来抽,但钱不是他掌管,还得请示母亲这个“财政大臣”。当然,虽然母亲嘴里会骂父亲,但心里还是很疼他的。这一点要求,母亲当然答应,因为本来钱也是父亲挣得多,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又偶尔在母亲面前唠叨:“这些天,我也该抽条好点的烟了,辛苦了大辈子。”母亲还是不耐烦地反驳他:“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当然,母亲这话是说给我们听的。

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当然不会忘了买两条烟回家,其中的一条是专门买给父亲的,另一条是亲戚朋友随便抽的。而让我闷闷不乐的是,我给父亲买了烟,他嘴里叼的却是一支“红双喜”。我有些不高兴地问:

“爸,你干嘛不抽我专门买给你抽的烟呢?”父亲理直气壮的回答:“你姐给我买了条‘红双喜’,她比你提前回家,也比你大,我先抽抽她买的烟,你买的就留给亲戚、朋友们抽吧。”第二天,父亲抽的又不是“红双喜”了,而是“白沙”。我心想:父亲怎么那么倔呢?太不给我面子了!我便又开口问他:“你干嘛不抽我买的‘黄果树’呢?”父亲还是那句话:“你姐给我买了条‘白沙’烟,她比你提前回家,也比你大,我先抽抽她买的烟,你买的就留给亲戚、朋友们抽吧。”

工作后的第二个春节,我还是买了两条烟,一条专门买给父亲抽的,另一条是给亲戚朋友随便抽的。我到家时,哥哥已经提前一天到家了。我起初还担心父亲又因为哥哥比我先到家而不抽我买的烟,没想到,等我把烟一递给他,他就毫不客气的抽起来了,笑容满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抽我买给他的烟,我顿时喜出望外。

晚上喝了点酒,我大胆地问父亲:“爸爸,为什么去年你要先抽姐姐给你买的烟,而把我买的留给亲戚、朋友抽呢?”当时,父亲已有三分醉意了,听了我的话马上变得严肃了起来。沉默少顷,父亲慢慢说道:“孩子,虽然我们家现在条件变好了,我也不愁没烟抽了,但是你姐姐买的烟和你们哥俩买的烟味道不一样呀!你姐姐在那么远的地方打工,工资也不高,上班环境也不好,还要经常加班……都怪我当年没让她多读几年书呀!”说着说着,父亲开始哽咽起来……

当晚,我给姐姐打了个电话,我们姐弟聊了很久……

烟画：打鼓的



□ 东方

有一首描写老北京打鼓的诗:鼓小声闻深巷中,破筐能把泰山笼,半文买下兰亭序,转眼卖与豆腐翁。这首诗言简意明,极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行当的经营方式、特征和特色。

打小鼓,是这一行的幌子。左手擎着一只方寸的单皮小鼓,右手用竹槌子啪啪一敲,人们就知道收旧货的来了。打鼓的挑着两只破筐,

专门串胡同。他们什么东西都收,这两只破筐什么都装。这行人文化都很低,也不识货,就是收到了价值连城的東西,也当废品卖了。言外之意,这一行只有微薄小利,是一种不入流的生意。

我曾亲眼见过一次他们的糊涂交易。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上中学,一日同京剧名票阎仲奇先生走在西城武侯侯胡同,见前边走来一个打鼓的,筐里挑着一大卷黑糊糊的纸片,有二尺多高。阎先生酷

爱书法,老远就看出了是一摞拓片,忙迎上前去,客气地问:“掌柜的,您这摞废纸怎么卖?”打鼓的放下挑子说:“不瞒您,这摞废纸是从胡同口一位老太太那儿收的,十六斤,三分钱一斤,给了她五毛钱,合五斤棒子面。您称称,也别叫我白挑半天,您看着给。”阎先生假模假样地咬了咬牙说:“那我给一元吧!”“您真痛快,我给您挑家去!”就这么着,阎先生落了一份全套的《初拓三希堂法帖》,当时值人民币500

不抽烟的人说说抽烟的事

□ 新华

想当初谈恋爱时,我与他相隔遥远,只能鸿雁传情。我知道他抽烟,但没有见过他抽烟。我想像他吞云吐雾的样子,带点浪漫色彩。有一次他寄来的信纸上有被烟灰烧的小洞,我仿佛闻到了淡淡的烟草味。那也是一种浪漫的感觉。但这绝对不代表我喜欢抽烟的人,喜欢闻烟味。

见过很多有烟瘾的人。有的人上班坐校车几十分钟,每天一下校车,就开始掏烟点烟,边走边抽。有的人在会场开会,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溜出去抽根烟,不然就在那里打哈欠,无精打采。如果是小型会议,有的人可能懒得出去了,直接就在会议室抽起烟来。有的人在旅途中,一有下车的机会,就立马抽烟。有些人对烟有很深的依赖。思考时必须抽烟,不然短路;烦闷时必须抽烟,不然不爽;疲倦时必须抽烟,不然没劲;闲着时必须抽烟,不然无所适从;紧张时必须抽烟,不然无法平静……对他们来说,烟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见过抽烟的男人们在一起的情形。有的人用烟来套近乎,献殷勤,一根烟毕恭毕敬地递过去,对方一接,仿佛关系就进了一步。一帮哥们在一起,你发一圈,礼尚往来,他发一圈,不搞得乌烟瘴气,不会善罢甘休。自己快乐一时,却苦了

那些被动吸烟的人。

听过一些女人对男人抽烟的抱怨,以及管男人抽烟的经验。有的女人很厉害,能够管住男人不在家抽烟,男人如果实在要抽,也只能在阳台上打开窗户对着外面抽。女人在家里管自己的男人抽烟问题不大,可以不留情面,也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在管不住时,她还可以躲开,毕竟家里不止一间房。但女人要在外面管别的男人抽烟就比较困难。比如,和你同办公室的男士,他要对着你抽烟,你就不好打开门,请他出去抽;和你同车的男士,他要坐在车上抽烟,你也不好叫停车,让他下去抽;聚餐时,同桌的男士们一轮又一轮地抽烟,你更不能扫他们的兴,叫他们不要抽烟。而且,你还无处可躲,你就只能看着他或他们快乐,你自己难受。你也只能在心里指责:只知道自己快乐,不顾及别人感受,真讨厌!不道德!

不能简单地讨厌抽烟的人,但讨厌抽烟的人对着别人抽烟,尤其是对着我抽烟。我有时候想,如果抽烟的人,只要看到有女人和小孩子在场,就坚决不抽烟,那该多好啊!如果不抽烟的人只要看到抽烟的人对着自己抽烟,就坚决表示抗议,那该多好啊!这样,抽烟的人、抽烟的次数应该就会减少。谁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但如果用这条去劝抽烟的人不要抽烟,其实很难



奏效。他为了抽烟有理,抽得坦然,会说一些例子来反驳你,说谁不抽烟不喝酒也早早地得病死了,谁又抽烟又喝酒,照样活到八九十岁。他不仅举例子为自己辩护,还可能跟你理论一番:一个人想抽烟,说明身体需要,既然是身体需要,就应该抽。不抽,可能反倒出问题。有烟瘾的人一般都抱着侥幸的心理或坚定的信念,不到身体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时,不会停止抽烟。就算身体出了问题,但一旦有所好转,又有可能死灰复燃,继续抱着侥幸的心理和坚定的信念。

抽烟的人不少,但不抽烟的人更多,讨厌抽烟的人也越来越多。讨厌抽烟,是讨厌那难闻的烟味对空气的污染,是担心被动吸烟对身

多。

清季,大学问家纪晓岚在《笔记》中把打鼓的分为两种:一种是打软鼓的,打的小鼓,直径有一寸余,声音大而低,肩担粗筐。如上所说,他们专收废铜烂铁、破衣烂衫、旧报纸、旧玻璃瓶等。第二种是打硬鼓的,所打之鼓,直径不到一寸,声音小而尖锐,肩担较细之竹筐,并蒙以蓝布,专收细软物品,如瓷器、家具、古玩、陈设等物。再细者则不肩担,只背一大布褡裢,专收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等等物。他们的下家,可就不都是“豆纸翁”了。他们与古董商、字画铺、古玩店、首饰楼的掌柜的、伙计们多有来往,收到了值钱的好东西,便送上门去,请他们掌眼,卖个好价钱。传说,这种打鼓的,有人还专收大户人家中不肖子弟、下人、老妈子等偷出来的东西,不计较给价多少,急着出手,等于变相销赃。这么干,发了财的也不乏其人。民俗学者齐如山先生说,这一行看似单干户,但实有组织和行规。“如某人售物,与一打鼓人交易不成,则再来者给价必定小于前者,再来第三者,则价更小,盖彼等皆有约会,是其不正当之鬼蜮伎俩耳。”

烟草专卖监管路上的“滋味”

□ 谭少松

现如今,消费者被习惯地称之为“上帝”,而作为一名烟草专卖打假的执法人员,很想并成为与“上帝”并肩而行的同路人,说实话,在专卖维权一线摸爬滚打后才知道,要做好维权打假工作,就必须摒弃自身的娇气和莽气,以忘我的精神去感受消费者、经营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心声,去倾听他们的呼唤,去了解并品味烟草专卖监管上的酸甜苦辣。

酸:有一种经营场所是我们烟草专卖监管的难点之一,那就是网吧,包括黑网吧,看着那些懵懂少年逃离学校课堂而在网上搏杀时,那一张张沉迷网络的脸、一双双在拼命敲打键盘或鼠标的稚嫩小手、一支支腾云驾雾乐似“神仙”的烟嘴、一颗颗无知却在受害的心灵,着实让我们对网吧的无比痛恨。网吧大多属于无证经营,在受理的举报和投诉中,网吧售烟和学校周边的卷烟零售户,所占比重还比较大,因此,为解决和挽救沉迷于向往醉生梦死的未成年人,与工商部门协同查处网吧和黑网吧及其销售卷烟行为的联合打击行动,就成为了我们的酸楚,但是一场漂亮的网吧歼灭战下来,当收获了查扣违法违规卷烟数百条、督促在场学生重返校园的阶段性成果后,我们想,身上的担子还很重很重。

甜:源自于那些普通卷烟消费者不吝赞赏的表扬话语,当每次市场检查或跑线巡查的时候,有围观群众对烟草专卖稽查工作人员的执法态度和工作业绩表示非常认可的时候,那内心的甜蜜和喜悦就不言而喻了,市场是比以前干净了许多,假烟也比以前少了很多,消费诚信度也较以前增加了许多,这些都离不开烟草稽查尽职尽责的恒心和守土有责的决心,但是,要打击更趋向于隐蔽化的非法卷烟销售网络,达到市场净化率确保要求的百分百,我们要走的卷烟打假道路还很长很长,那时更要怀着一颗必胜的信心。

苦:种种那些不被理解和误会的委屈;在一线稽查工作中,不仅会拥有消费者和现场群众的感激和谢意,同时也得应付消费者、经营者及社会各界质问、指责、不解、误会,乃至谩骂、骚扰和恐吓,绝大多数的专卖执法人员都会碰上过以上的“苦闷”问题,指责为什么不查别的零售户而专门针对我检查、明明是自家库房却以种种理由和托词拒绝配合检查、查到了违法违规卷烟却鼓动亲朋好友上来抢夺,更有甚者,还诬蔑和诽谤有执法人员偷偷柜台内的钱物等等,虽然,上述事情在后来的进一步调查后,能得到妥善和公平的解决,也能对我们执法人员主动认错和自我检查,但,其过程还是让我们很是委屈,也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伤痛。

乐:是那些得到满意答复的笑脸;如在接受投诉举报的现场,鉴定卷烟后的以诚交流,对消费者耐心而又细致地解释,并现场教授真假烟的辨别知识,并批评经营者语气和行动上的注意点,并严格要求其遵守烟草专卖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出售卷烟制品,看着那本来剑拔弩张的双方在自己的调解下,刚开始紧锁的愁眉随后终于舒展开来,最后能主动地握手言和,内心在想,再辛苦也没有白费,累并快乐着。